

略谈字典编撰的历史继承

杜道生

不同的字典词书都因其性质的差异而确立自己的编撰原则。《汉语大字典》是一部古今楷书汉字的大汇编，偏重于提高的大型语文工具书，因而提出了“古今兼收，源流并重”的原则。这一原则的制定是在深究旧字书编写体例之后，概括地、科学地、针对实际而揭示出来的，适用于汉字形、音、义各个方面。本文拟就此原则所涉历史的继承谈谈收字和根据字书编字书的问题。

关于收字。语言文字都有其社会性，它不随个人意志而变化，否则，将失去其交际、交流思想的功用。因此，历史的继承对语言文字来说更重要的意义。历代字典词书的编撰对此都给予了充分的重视，并反映在他们的叙文和凡例中。《说文·叙》：“今叙篆文，合以古籀。”《正字通·凡例》：“在正字头训解之后，兼载古、籀、篆、隶、俗、讹。……酌收释、道、医经、杂技、方俗之字。”《康熙字典·凡例》：“以《说文》为主，参以《正韵》，不悖古法，亦复便于楷书。”《中华大字典·凡例》：“收录古、省、或、俗、讹之外，兼收方言及翻译新字。”等。都把遵崇传统和当时的规范相结合，并兼顾社会的各个方面，予以适当的增补。据此，我们可以把字典词书的收字原则概括为四句话：

作好历史的继承（存古），

促进书写的规范（正字），

进行不断的补充（拾遗），

切合实际的使用（利今）。

《汉语大字典》也正是遵循此原则，对收字作了明确的规定：“收字以历代辞书为依据，并从古今著作中增收部分单字。”这就使字典继承历史的传统，根据各时代的发展予以补充和规范，以利当今的使用。

关于根据字书编字书。字典词书工作以“记注”来进行“撰述”，用“编辑”来进行“创作”，其任务在于做好审阅、选择、组织、排列、核对等。所有工序都是依靠所占有的资料来进行，不能逞臆奋笔，无法自我作古。根据字书编字书这个说法，个人比较相信。它深含历史继承的意义，又不是简单的照搬，机械的录用，而是有所借鉴，吸收其精华，剔除其糟粕，纠正其讹误。兹择举历代字书，拮据其要，以申鄙见。

《说文解字》。许慎在其叙中提出：“必遵修旧文而不穿凿。”“今叙篆文，合以古籀，博采通人，至于小大，信而有证，稽谫其说。”两段话有三个内容：（1）遵用传统资料；（2）以现实文字体系为规范；（3）广泛搜集、考订、核实新资料。

《切韵》。原书散佚。《大宋重修广韵》为现存的极重要的代表《切韵》系统之韵书。

它篇首保留了原书叙文，有两段话值得注意：“以今声调，既自有别，诸家取舍，亦复不同。”“吕静《韵集》，夏侯咏《韵略》，阳休之《韵略》，周思言《音韵》，李季节《音谱》，杜台卿《韵略》等，各有乖互。”《广韵》搜寻韵书资料，有所据选精取。这就是陆法言所谓：“遂取诸家音韵、古今字书，以前所记者，定之为《切韵》五卷。”

《字汇》。以《洪武正韵》为底本，溯源理流，皆有所据。其“凡例”首条云：“字宗《正韵》，已得其概，而增以《说文》，参以《韵会》，皆本经史。”《正字通》则援本《字汇》，加以订补。“阙者增之，误者正之。”《康熙字典》又以《正字通》为底本，并以《说文》为主，参以《正韵》，厘正其误。定引书之次第，去音训之繁冗，“备采字书、韵书，经、史、子、集来历典确者，并行编入，分载各部各画之后，上加‘增’字以别新旧。”《中华大字典》改编《康熙字典》，去其重复，正其错误，分音立目，分项列义，有所增删，便于实用。

《中华大字典》之“叙”文有一段论述，谈到经验教训，值得借鉴。

“字书亦天下事物之至烦难者矣。然天下事物，皆各有其自然之条理，循而分之，虽不能善，将皆可以粗安其所。苟不深察事物之条理，而惟吾意之所欲为，未有不溃败决裂者也，且清室以帝力勒为字典一书，意将范夫万世。岂知群制变迁，事物滋长，即无今日之举，而《康熙字典》者，亦不足以久垂。以此见一于竺古怀旧者，终无当于世变也。”

这很显明地为编写字书的人提出两个要点：（1）遵循客观事物之自然条理，循而分之；（2）面对现实，赶上发展进化。这是很值得深思熟虑的。

根据字书编字书的概况，略如上述。

《汉语大字典》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为指导，博采众家之所长，广集形、音、义诸方面的资料，去粗取精，去伪存真，尽最大可能全面地、客观地反映汉字形、音、义的源流演变。前修未密，后出转精。我们看到了《汉语大字典》所取得的辉煌成果。

（上接第106页）

欺老翁”。仇注用“人情浇薄”、“夔峡俗浇”斥之。笔者以为，杜甫作为“北客”，本来就孤独无援的心态，加以老病缠身，稍不如意就会牢骚满腹，有异乡受气之感。但我们翻遍夔州诗，丑化夔州人的不过如《园官送菜》之类。我想，这和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的“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”恐怕差不多。相反的是，我们发现他和夔州人民关系倒处得相当融洽，他称赞獠奴阿段是“曾经陶侃胡奴异，怪尔常穿虎豹群（《示獠奴阿段》）”。写信行的为人是“汝行不茹荤，清净仆夫内，秉心识本源，于事少凝滞。”为报答信行远修水筒之劳，特裂饼分瓜（《信行远修水筒》）。《负薪行》不是还在为夔州男子辩护：“若道士无英俊才，何得山有屈原宅”吗？总之，我们既要看到诗人对夔州一些落后风俗的不满，更要看到他对人民的同情和爱护，诗人批判的矛头总是直指着黑暗的社会和不体谅人民的大小官吏的。

夔州诗的山川风物描写是杜甫夔州诗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它以其鲜明的地域特色区别于中、前期的诗歌创作，它给人们增添了地理学、动植物学、民俗学和社会学各方面的知识，培养了人们欣赏祖国山川古迹的美感和追溯人类文化奥秘的兴趣，它同时也以深刻的现实性和人民性为我们提供珍贵的文化遗产。有些人讥这些诗为“吟风弄月”和“无病呻吟”之作，这是一种偏见，我们不能赞成！